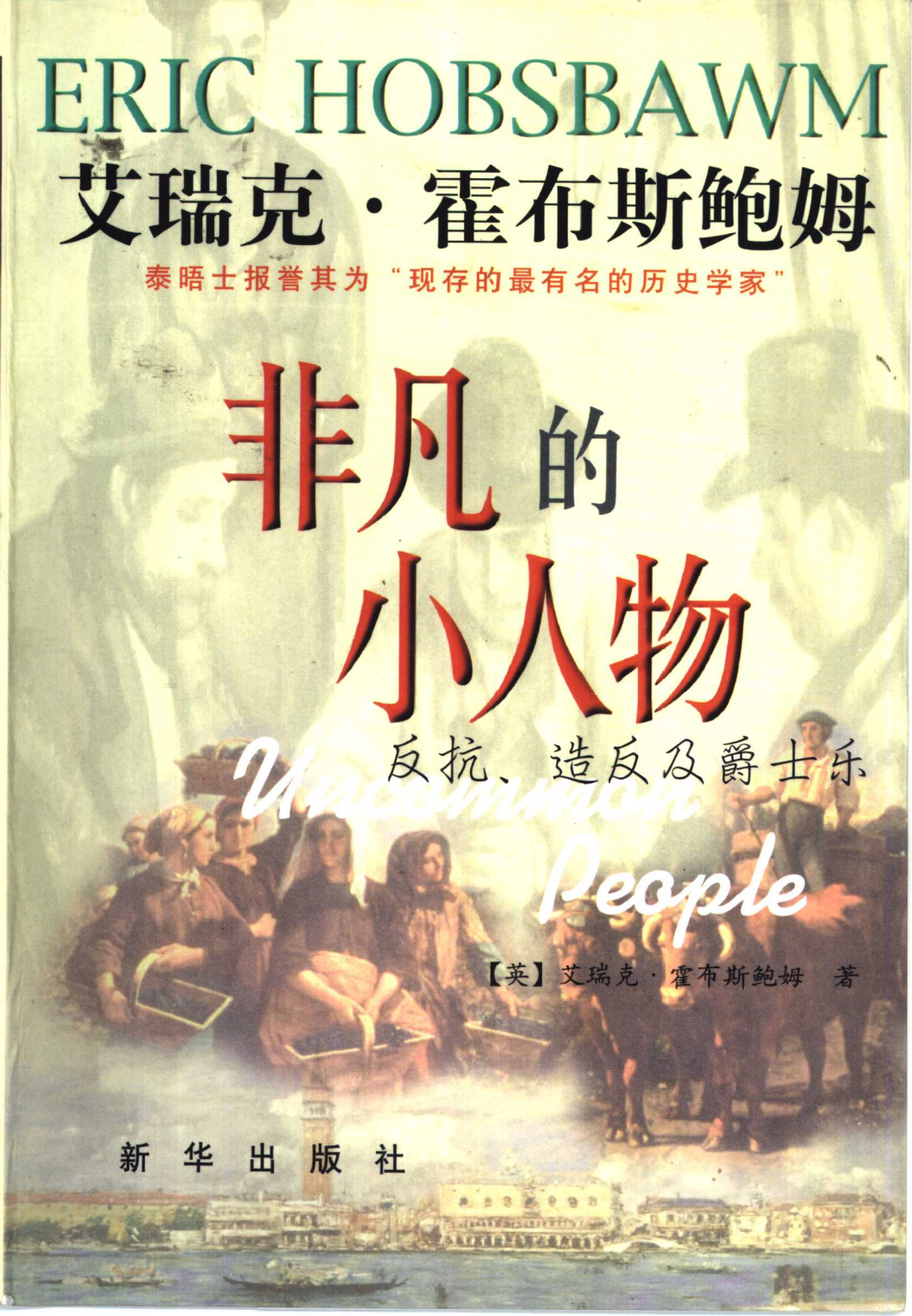




ERIC HOBSBAWM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泰晤士报誉其为“现存的最有名的历史学家”

非凡的 小人物

反抗、造反及爵士乐
Uncommon People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新华出版社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非凡的 小人物

反抗、造反及爵士乐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王翔 译 / 柯雄 校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凡的小人物：反抗、造反及爵士乐 /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 王翔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8

ISBN 7-5011-5319-1

I. 非… II. ①霍…②王… III. 平民—研究—世界—18 世纪~20 世纪 IV. K8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14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1-2219 号

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Jazz

Copyright © 1998 Eric Hobsbawm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专有出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非凡的小人物

——反抗、造反及爵士乐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王 翔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插页 2 张 36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319-1/K·358 定价：30.00 元

前 言

本书所谈到的人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除了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以外，别的人通常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同样，在现代国家中，那些负责登记出生、婚姻和死亡的办事处也才有他们的记录。有时，那些搜寻“普通人故事”的记者和警察也会知道他们。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名字完全不为人知，而且也无从得知，正如以前欧洲和非洲的男男女女，种植当年从刚发现不久的新大陆引进的作物，从而改变了世界，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无人知晓。有些人在诸如街道、乡村、礼拜堂、分会、地方会社之类的范围不大的地方性的公共场合中起过一些作用。在现代媒体发达的时代，音乐界和体育界的少数人可以一夜走红，但是在从前，这些人也许一样湮没无闻。

正是他们组成了人类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之间的有关个人及其决策在历史中有多大重要性的争论不会涉及他们。显然，描述这些人的故事，将在宏观历史的叙述中显得无足轻重，了无痕迹。

本书的宗旨并不仅仅在于表明，应该把这些人从湮没中拯救出来，或者借用英国历史学家 E.P. 汤普森的名言来说，让他们不再蒙受“后世的傲慢骄矜”。当然应该如此，我也希望本书有些篇章——比如，《激进的鞋匠》和《农民的占地行动》——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正如《纽约人》杂志的已经去世的约瑟夫·

米切尔抗议某些人谈论“小人物”（即使是以同情态度谈论“小人物”）时所写的那样：“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一样大”。他们的生活和你我的生活一样有意义，即便没有任何人曾经写过他们的生平。我的观点是，如果不作为个人，而是从集体上来看，像他们这样的男男女女正是重要的历史角色。他们的所作所想，是起作用的。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改变了文化和历史的形成，而且这一点在20世纪最为显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一本关于普通的人，也就是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平民”的人的书，称作《非凡的小人物》。

他们并非像歇洛克·福尔摩斯认为异乎寻常难以侦破的案件那样是“毫无特色平淡无奇”。他们是怎样由自身的过去和现在所塑造，他们的信念和行动的理性基础是什么，他们怎样反过来塑造他们所处的社会和历史：这些就是我这本书所关注的焦点，我希望这能够为本书提供一个基本统一的主题。

本书分四个部分，其中有三个部分分别描述特定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环境：激进传统（1—10章），论及工人阶级以及与工人运动相关的意识形态；乡里人（11—13章），论及传统的农民；还有爵士乐（19—25章），论及这一完全根源于穷人生活的重要艺术发展演变之一。第四个部分，当代史（14—18章），也和我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主要论及的那些事态很难说是与有意识的人的意图和决策相关，尽管传统的做法总是把它们放在这种条件下加以讨论。然而，我也承认，我很高兴能够重印至少一篇成功分析当代现象的论文。我也忍不住在这个部分的结尾加上了一篇文章，讲述一名在奇怪的冷战时代被错误地遗忘掉的美国恶棍，这篇文章原发表于当时创刊不久的《独立报》的“英雄与恶棍”的文章系列，当然，它的依据是尼古拉斯·冯·霍夫曼的没有尽然向读者交待清楚的作品：《公民科恩：罗伊·科恩的生活和时代》（纽约，1988年版）。

正如这些文章所表明的，这些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贯穿了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它们延续了我早先研究劳动人民和几乎40年前出版的两本书（《原始的造反者》和《爵士乐风景线》）所遵循的探索路线。《非凡的小人物》把我写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一批论文集合在一起。这26篇文章中，有11篇曾经出现在以前出版的书中，比如《劳动者，革命家》及《劳工的世界》（美国版的书名是《工人们》）等书，其余的文章至少在英国不曾用我的名字以书本的形式出版过。

本书每一篇章开头均有更详细的说明。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98年于伦敦

目 录

前言	(1)
----------	-------

激进传统

1 托马斯·潘恩	(1)
2 砸机器的人	(7)
3 激进的鞋匠	(28)
4 工人运动的传统	(74)
5 工人阶级的形成, 1870—1914 年	(93)
6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120)
7 男人和女人: 左翼的形象	(149)
8 节日的诞生: 五一劳动节	(176)
9 社会主义和先锋派文艺: 1880—1914 年	(200)
10 左翼的喇叭筒	(218)

乡里人

11 农民与政治	(227)
12 农民的占地行动	(255)
13 匪徒朱利亚诺	(294)

当代史

- 14 越南与游击战动力 (307)
- 15 1968 年的五月风暴 (323)
- 16 暴力的规则 (336)
- 17 革命与性 (344)
- 18 一个恶棍的墓志铭：罗伊·科恩 (350)

爵士乐

- 19 爵士乐中的卡鲁索 (354)
- 20 康特·巴锡 (369)
- 21 “公爵”埃林顿 (381)
- 22 爵士乐来到欧洲 (397)
- 23 大众的摇摆乐 (410)
- 24 1960 年以后的爵士乐 (420)
- 25 比莉·霍莉黛 (437)

- 26 旧大陆与新大陆：哥伦布 500 年祭 (440)

- 译者的话 (452)

激进传统

1

托马斯·潘恩

本章首次发表是作为对一部潘恩^①传记的评论而出现在 1961 年的《新政治家》周刊。在那以后又出版了几种潘恩传记，尤其是约翰·基恩写的一种写得更好，但它也必定会引发同样的思考。

稳健的革命，这在措辞上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尽管我们可以用稳健这同一个词来形容一次暴动、一场政变或一个宣言。不管一次革命的公开目标多么有限，天堂圣城^②的光芒必将冲破旧势力那看似永恒的大厦而从裂缝中照耀进去。当巴士底狱陷落时，旧世界的种种常规都被束之高阁，男男女女自然也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期待乌托邦的来临。革命者也因而被罩上了千禧年的光环，而不论他们的实际主张是如何强硬或如何谦逊。

这是一个“可以期待任何事情发生”的时代，而汤姆·潘恩正反映了这一彩虹般的时代之光。他所看到的是“一片全新的景象，欧洲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而革命这一称号实在不足以描述它的全部特征，它将上升为人类的再生。他认为：“从此以后，目前的时代将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理性的时代，现

今这一代人在后人的眼里可谓是新世界的亚当。”美国独立了，巴士底狱陷落了，而潘恩正是这些辉煌事件的代言人。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能够参与两场革命，可谓不虚度此一生。”

然而，这样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天生的革命家，其实际的政治主张却几乎是令人奇怪的温和。他的目标在于“全球的和平、文明和商业”，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自由贸易商人如出一辙。就经济问题而言，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改革”，他也刻意否认有这种想法。私有企业在他看来已经十分美好，而“最奏效的办法就是让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对社会罪恶的分析归根结底就是战争和苛税，除了某些时候，军火的利润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超过了对政府高额开支的担心，这一分析依然是苏塞克斯郡一带的中产阶级商人^③所遵循的颠扑不破的原则。潘恩对于社会经济最为激进的见解也不过是提议征收 10% 的遗产税用以负担养老金。来到法国后，他也和其他的英国“雅各宾派”一样加入了法国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即使在这样的组织中，他也充当着稳健的角色。

然而潘恩依然是一位革命者，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曾经有一段时间，殷实的工厂主们准备采用竖起街垒的办法（更准确地说，是支持这种做法）以对抗那种偏袒王公贵族而歧视商人的不公正的力量，这一力量阻碍了“文明所应带来的普遍的幸福”。令人惊奇的应该是潘恩作为革命发言人的非同一般的而且事实上可能是空前的成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

其他一些政论小册子的作者有时也会一鸣惊人而博得鼓动家的名声，一时之间成为群众的代言人。而潘恩却梅开三度，他于 1776 年出版的《常识》使一直没有阐明的对美国独立的渴望变得明确而又清晰。1791 年，他写出了《人的权利》来捍卫法国革命的理念，道出了大部分英国激进分子的心声。据说此书在几个月内就售出了 20 万册，而当年全英国的人口，包括不识字的

幼童和文盲，也不如今日的大伦敦一个地区。1794 年出炉的《理性时代》则是头一回直言不讳，以平民化的语言宣称圣经并不是神的启示。此后本书就成为阐释工人阶级理性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显然如此三次成功绝非偶然。

这当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潘恩本身就是和他的读者类似的人，他们自我奋斗、自学成才、自食其力，还没有最终分化成雇主和雇员这样的不同阶层。而潘恩学徒生涯丰富，从事过裁缝、英语教师、小职员、烟草商、记者等职业，而且是一个“具有发明才能，希望在英国推广他的机械发明的人”，正是为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些群众说话的一时之选。碰巧，作为发明家和记者，在公众中他有同样不可思议的人缘。工业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单项建筑就是横跨在威尔河上的无墩铁桥^④，它的形象曾经出现在当时无数的水壶上，这座全球最早的铁桥就是以潘恩的原创设计为蓝本而建造的，尽管这项工程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对革命事实的发现则使得他如同他的读者一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的确如此，这一发现成就了潘恩。但是在 1776 年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本可能成为文学界的一个小角色，甚至更可能是一个发明家或者失败的实业家，因为应用科学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朋友——但别的人恐怕不会知道他——原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智者，一个小镇社会的魅力之星，一个运动员和棋牌高手。他们也可能对他嗜好白兰地而略表惋惜，而且时不时的也会对他如此善于欣赏女性魅力却又毫无性生活的现象感到费解而议论一番。如果不是因为机敏过人的富兰克林的推荐使他移居美国，人们就会忘记他的存在。如果他不是时逢革命，得以再生，他的名字只能是出现在古董一般的博士论文中。

但是他的名字终于没有泯灭，尽管他没有过激思想；（然而在法国国民大会中他却是惟一反对）尽管除了当记者时的短暂风光，在政治上他也一直命途多蹇；尽管在正统的自由主义世界他

并没有一席之地；他的名字还是作为典型出现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离经叛道的党派中。因而，他的全集也曾由一位共产主义人士来编撰完成。

但是他没有被忘却，而且相当典型的是，纪念他的人不在正统的自由主义阵营，而是在派系强的政治及神学造反营垒；尽管他除了当记者有过短暂风光之外在政治上一直命途多舛，尽管他没有过激思想，情况却竟然是这样。（虽然他首先倡导共和国，但在法国国民大会中他是惟一公开反对处死路易十六的人），潘恩的传记大多出自左翼作家之手；他的文集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编辑的。

原因何在呢？对于潘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不管他们曾经怎么想，依靠发展私人企业而得到拯救终究不是答案。他和他们所公开反对的是挡在“自由”之路上的“特权”；但事实上他们也反对那些把他们抛入贫困深渊的尚未被认识的新的力量。作为手艺高超的工匠、小店主或农场主，他们具有相当独立的意识而把自己看做社会的未来，他们并不是因为深受压迫而命里注定要求革命（比如像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无产阶级那样），而是他们认定作为独立自主的人如果还是失败，将是十分荒谬，违反理性的事。只有等到20年后，潘恩型的具有理性思想的手工业者才会通过“全面的联和”以及互利合作的联盟寻找解救之路。但是当时，贫困已经成为他们集体所面临的事实，无从逃避而急待解决。

正是这些自食其力的穷人，潘恩为他们大声疾呼，对他们诉说。在他们看来，他那坚定而骄傲的献身精神比他的分析更有影响，这种执着充满了“高深的理性和感人的力量”，令哲学家孔多塞也甚为钦佩。当潘恩谈起人类的幸福时，他想到的是贫困和不平等的终结。尽管他一直追求减税和自由企业的建立，但革命

的重大问题始终在于：“是否人民可以继承他们的权利，全球的文明能否实现？是否人人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是否法律能够杜绝劫掠，而国家可以免于悲惨？”正是“在所谓文明的国家我们看到老人在济贫所里做工，而青年被送上绞架。正是贵族统治着广大贫困无助、生活悲惨的底层民众，而他们却被告知他们是快乐的。”

但是潘恩不光告诉他的读者“贫穷是与幸福、文明不相容的”，他也昭示他们理性之光已经降临人类以使他们摆脱贫困，而革命也表明理性必胜。在反叛者中，他是最不具浪漫主义精神的一位。不言而喻的，基于实践的、手工业者的常识将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发现了理性像一把利斧可以在奴役和无知的丛林中开辟解放之路，单是这一发现就足以成为重大的启示。

透过《理性时代》的字里行间，就像参加了一个几代工人阶级的思想聚会，处处流露着理性的赞歌，因为一旦你下定决心看清事实就会轻易地发现牧师关于圣经的布道，富人对社会的解释都是满纸的谎言。而《人的权利》一书则通篇闪烁着这一伟大真理的显而易见的必然性。伯克^⑤认为革命的理性意味着“所有生活中冠冕堂皇的遮羞布将被撕去”，让我们“赤裸的，颤抖的人性本质”连同其种种缺陷毕露无疑。潘恩并不在意理性的赤裸，它将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暴露在无穷可能性的荣耀之中。潘恩的人性就像希腊时代的运动员一样赤裸着，因为它一直在为着奋斗和胜利而做好准备。直至今日，每当我们细读那些清晰、简明的语句，常识也就上升为英雄主义的战歌，仿佛一座稳固的铁桥飞架于塞特福德镇和天堂圣城之间；我们为之欢庆，为之感动。即便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我们怎么能忘记向他欢呼敬礼呢？

注释

1. 潘恩 (Thomas Paine, 1737—1809), 出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的政论家。

2. 新耶路撒冷: 原指神的寓所, 这里指人间的天堂。

3. 苏塞克斯郡是伦敦郊外的一个县, 有一批生活方式相同的中产阶级住在那里。

4. 这座桥是世界上第一座铁桥, 人们因此制作了大批的盘子、水壶以表纪念。

5. 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爱尔兰政治家, 作家。

砸机器的人

本文的目的在头一页就讲得很明白。它是为英国工人运动辩护，驳斥历史学家 E.P. 汤普森后来所指出的那种“后世的傲慢骄矜”；此外，还可以补充说，也驳斥当今的一些理论家。此文最初发表于 1952 年，载于作者和他的一批友人当时刚创办的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的创刊号。该杂志至今仍畅销不衰。

也许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早期工业史中发生的毁坏机器的问题了。有关这种方式的早期工人阶级斗争，误解依然广泛存在，连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不例外。例如，一本 1950 年出版的优秀作品仍然把砸机器的勒德派运动*描述成一场“毫无意义的、狂热的工业盲动，而另一位在这一领域贡献最大的杰出的权威也把这些在 18 世纪流行于各地的暴烈行动轻描淡写为过度的兴奋和高涨的热情导致的过激的反应。^①在我看来，造成这些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始终坚持 19 世纪早期阐述过的有关采用机器的观点，以及 19 世纪形成的有关劳工和工会历

* 亦译“卢德派运动”。——译注

史的观点，其倡导者主要是韦布夫妇* 及其费边社的追随者。也许我们应该把观点和假设区别开来。在许多有关捣毁机器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可以察觉到 19 世纪中产阶级经济辩护士所持有的假设，认为本该让工人明白不管经济的现实多么不如人意也不应该反抗现实；而费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假设则是：在劳工斗争中强硬手段不如和平谈判有效；这两派还都断定：早期的工人运动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残酷的现实压力下盲目地摸索着作出反应，就好比实验室中的动物对电流刺激作出反应一样。大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机械化生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够理解并同情这种长时期的无望取胜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除了小部分受惠的人以外，所有的工人都反对新体制；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场徒劳无益的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上述的心照不宣的假设仍有待推敲。意识到的观点则显然蕴涵了不少真理的成分。但同时，这二者都模糊了许多历史的真相。这样就导致人们不可能对前工业时期工人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真正的研究。然而，对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略作观察就会看出，将 1815 年到 1848 年间频繁发生的孤注一掷的反抗与退却的画面回头过远地投射到历史的深处，有多么的危险。其实，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才告终结的那漫长经济繁荣岁月中出现的早期工人运动，在认识上是有限的，组织上也是窄狭的，但在此限度之内，这些运动是不容忽略的，其结局也并非全然的失败。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后来的挫折而变得模糊不清：首先，曾经很有实力的西英格兰毛纺业组织完全烟消云散，

* 韦布夫妇，即 Webb, Sidney James (1859—1947) 和 Beatrice Webb (1858—1943)，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全国性工会兴起后才得以恢复元气；其次，在 18 世纪 60 年代还能取得实际上的劳资协议的强有力的比利毛纺工人行业协会在 1790 年后也消散了，而且直到 20 世纪初为止，工会活动实际上未曾再兴。^②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早期工人运动的力量，至少是在英国不应忽视；而且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基础通常在于拆毁机器、暴动和破坏财产，我们才能搞清运动的含意。

在广大非专业人士看来，“砸机器的人”和“勒德分子”这两个名词可以互换。这也是自然的，因为在 1811 到 1813 年间，还包括 1815 年滑铁卢之战后的几年，爆发起来的勒德运动，比起任何其他年代的工人运动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据信也迫使政府出动更多的军队加以镇压。政府用来对付勒德人运动的军队多达 12000 人，大大超过了 1808 年威灵顿远征伊比利亚半岛时率领的英军人数。^③人们自然会首先注意勒德运动，但却往往把它和一般意义上的拆毁机器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后者作为一个严肃的社会现象是始于（如果说它有一个开头的话）17 世纪的某一阶段，大约一直延续到 1830 年左右。的确，1830 年那一系列被哈蒙兹称为“最后的工人起义”的农场劳工起义，尽管不可避免地也破坏了相当数量的工业制造设备，但其本质上还是一场反对农场机器的斗争。首先，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而被当做单一的社会现象来对待的勒德运动实际上是涵盖了数种截然不同的砸机器的方式，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或前或后地都各自独立存在过。其次，勒德运动的迅速失败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砸机器的做法从来没有成功过。

让我们先来考虑第一点。我们看到至少存在过两种砸机器的